

# 欧阳修散文醇粹温雅成因探究

卓希惠

(福州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福建 福州 350116)

[摘要] 欧阳修散文多以感慨呜咽、委婉曲折、韵致深远的“六一风神”取胜,学界研究之着力点亦在于此。其实,其于记、序、书、论、碑铭、墓表等多种文体中反复呈现的醇粹温雅特质,亦足引起我们的关注与重视,而对其成因的探究尚有一定的空间与价值意义。其形成原因既与欧阳修长期接受儒学熏陶而形成的宽厚仁爱个性有关,复与中唐韩愈以来明道复古、革新时政、振兴古文理想追求与现实努力更是关系密切。同时它也是儒家中和雅正审美观念的折射,文学传承上则多得益于史传文学醇雅温厚文风的濡染与熏陶。

[关键词] 欧阳修;散文;醇粹温雅;成因

[中图分类号] I207.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73(2017)02-0083-04

欧阳修散文多以感慨呜咽、委婉曲折、韵致深远的“六一风神”取胜,学界研究之着力点亦在于此。其实,其于多种文体中反复呈现的醇粹温雅的特质,亦足引起我们的关注与重视,而对其成因的探究尚有一定的空间与价值意义。

## 一

我们先来考察一下,这一醇粹温雅、雍容和缓的特质,在欧文记、序、书、论、碑铭、墓表等具体文体中是如何呈现的。如被朱熹誉为“六一文之最佳者”<sup>[1]</sup>的《丰乐亭记》,记一亭而思及由乱而治的历史现实,体现欧阳修对当今国家安定太平局势的肯定,对百姓和乐生活的颂美,“意虽感慨,词犹和平”<sup>[2]2295</sup>“敷腴温润”<sup>[2]2306</sup>“太平气象”<sup>[3]</sup>,充分体现“盛世祯祥”<sup>[2]2305</sup>,是一篇典型的文辞雅正、风格醇和、温雅深厚的作品。《醉翁亭记》宣扬儒家与民同乐的思想文化精髓,风格“和平深厚,得文章正气”<sup>[2]2315</sup>。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等人上书要求革新政治,“庆历新政”从此开始,兴办学堂则是新政重要内容之一,欧阳修于次年为家乡所作《吉州学记》,记叙了吉州学堂建立前后情况,同时强调了学校教化的重要作用及意义。文云:

其明年三月,遂诏天下皆立学,置学官之员,然后海隅徼塞四方万里之外,莫不皆有学,

呜呼盛矣!学校,王政之本也。古者致治之盛衰,视其学之兴废。《记》曰:“国有学,遂有序,党有序,家有塾。”此三代极盛之时大备之制也。宋兴盖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学始克大立,岂非盛美之事,须其久而后至于大备欤?是以诏下之日,臣民喜幸,而奔走就事者以后为羞。其年十月,吉州之学成。<sup>[4]572</sup>

文章感慨政治盛衰、学校兴废,赞扬当今天子立学致治之盛,并勉励乡人好学向上,议论正大、蕴思深远、气象醇和、“浑厚朴茂”<sup>[2]2295</sup>、典则森然,“卓然儒者之文”<sup>[2]2296</sup>。《相州昼锦堂记》颂美韩琦功勋与品节:“然则高牙大纛,不足为公荣;桓圭衮冕,不足为公贵。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声诗,以耀后世而垂无穷,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于公也,岂止夸一时而荣一乡哉!”<sup>[4]586</sup>由主人公一己之荣耀推广到国家与百姓,认为只有这样方能勒之金石,声名播于后世而垂于不朽,主旨由小及大,由浅入深,“词调敷腴”<sup>[2]2244</sup>、风貌雍和、醇粹典雅。《真州东园记》是为江淮荆浙六路发运使许子春所建园林作记,文章记真州四方宾客往来之盛况,也是敷腴都雅、气象浑融之作。《有美堂记》既有都会繁华之渲染,又有湖山明丽之勾勒,人物盛丽、都邑雄富,文章风韵流溢,雍容雅致,醇粹可人。

[收稿日期] 2016-12-01

[基金项目] 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青年基金项目“欧阳修散文史学渊源研究”(项目号:2012C090)。

[作者简介] 卓希惠(1977—),女,福建福安市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散文。

除了诸多记事写景的记体文呈现风雅醇和、温厚雍容的特点之外,一些序文及时政议论性文章,如欧阳修担任馆职时起草奏议表序及为通宦名臣所作墓志碑铭,亦时含温裕之气。《外制集序》是欧阳修知制诰期间所拟诏令集序文,序中叙及庆历三年宋仁宗召范仲淹、韩琦、富弼回朝推行新政事,及由此生发感慨,文章“一路顺叙,风度雍容”“尔雅深厚”“雍容古雅”<sup>[2]2103-2104</sup>,有西汉文辞之风尚气度。《集古录目序》叙集古之不易,显得“清贵闲雅”<sup>[2]2222</sup>,《诗谱补亡后序》“文颇醇洁”<sup>[5]618</sup>。此外,“右文兴化,乃致治之所先。著录藏书,须太平而大备”的《谢赐汉书表》是“浑雄典则”<sup>[2]1782</sup>,《上范司谏书》是“情义淳笃,文思安雅”<sup>[2]1812</sup>,《新唐书·礼乐志论》论述了古代和唐时礼仪制度的嬗变与得失,文章“气度从容宽博”<sup>[2]2014</sup>,《论台谏官言事未蒙听允书》以曲折委婉之笔,助御史弹劾陈执中,林纾评云“议论切实中却含温裕之气,此欧公一生之本领也”<sup>[6]106</sup>。欧阳修墓志碑铭的撰写同样体现其一贯的醇和儒雅文风。由于欧阳修在当世的成就及声望,求撰碑铭墓表的达官显贵可谓众多。《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铭》是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王素为其父王旦请作神道碑,王旦为宋真宗侍臣,位高权重,故而文章写得“端庄肃穆”<sup>[7]410</sup>,洋溢着雍容典雅的风度,与墓主之高位威望相一致,被誉为“庄而不夸,赡而有制”的“大人物,大文章”<sup>[2]2374</sup>。《太子太师致仕杜祁公墓志铭》为仁宗时宰相、庆历新政重臣杜衍所作墓志,写杜衍立朝孤峻,雍容持节:“公自曾、高以来,以恭俭孝谨称乡里。至公为人,尤洁廉自克。其为大臣,事其上以不欺为忠,推于人以行己取信,故其动静纤悉,谨而有法。至考其始终之大节,虽古君子,有不能及也。其立于朝廷,天下国家以为重;退而老也,久而天子益思之。”<sup>[4]466</sup>行文温厚醇正、雅洁庄重。《尚书户部侍郎参知政事赠右仆射文安王公墓志铭》为参知政事王尧臣所作,王尧臣是政堂中卓有材识者,其“体量西事,荐用韩、范;安抚没、原,言将不中御;权三司使,去盘弊积钱数千万;为枢密副使,裁损滥恩”<sup>[8]</sup>,功勋至伟,故文章概写其绩,亦为“纯雅之文”<sup>[2]2477</sup>。《观文殿大学士行兵部尚书西京留守赠司空兼侍中晏公神道碑铭》是奉诏作文,墓主晏殊为欧阳修座师,其于政事无甚显功,然能使众贤聚于朝廷,则荐贤之功不应泯灭,文章重点叙此,故“端重醇正,得《雅》、《颂》之遗”<sup>[7]415</sup>。《胡先生墓表》突显北宋理学先驱胡瑗善为人师,教学得法的主要事迹,摹写其弟子之盛且贤,淋漓生色,所谓“先生之徒最盛”

“教学之法最备”“东归之日,太学之诸生与朝廷贤士大夫送之东门,执弟子礼,路人嗟叹以为荣”<sup>[4]389</sup>,极郑重而又不失于夸大,稳当而称情,文章“思理醇致”“彬彬儒雅”<sup>[2]2707</sup>。由此可见,欧阳修散文思理醇致、纯粹明洁、从容宽博、浑厚朴茂、雍容和缓、浑雄典则的特点是十分突出的,而学人“永叔之文雅而则”<sup>[9]592</sup>“唐而下,正大称欧阳氏之文”<sup>[9]721</sup>之评,不为虚语。那么,其醇粹温雅特质是如何形成的呢?

## 二

在古人观念当中,儒家经典具有“垂训昭纪,用之则治,不用则乱,直与覆载同功,日星并耀”<sup>[9]532</sup>的崇高地位。欧阳修对儒家六经十分推崇,认为六经承载儒家思想:“六经皆载圣人之道。”<sup>[4]633</sup>并以六经为治世法则:“昔者孔子当衰周之际,患众说纷纭以惑乱当世,于是退而修六经,以为后世法。”<sup>[4]311</sup>六经并非空疏抽象,而是切于世用,讲究实际的:“六经之所载,皆人事之切于世者”<sup>[4]668</sup>,“六经者,先王之治具,而后世之取法也”<sup>[4]1028</sup>。在具体古文写作中,他每每承继、阐发、弘扬儒家思想。其《本论》高扬辟佛崇儒的主张,《春秋论》《正统论》等宣扬《春秋》“大一统”的儒家思想。在欧阳修看来,儒家经典与儒家思想终将永恒存在,不朽于后世:“夫六经非一世之书,其将与天地无终极而存也。”<sup>[4]615</sup>陈亮《书欧阳文粹后》云:“公之文,根乎仁义而达之政理,盖所以翼六经而载之万世者也。”<sup>[9]345</sup>亦可见欧阳修对儒学浸染之深。

在儒家思想影响下,欧阳修更形成宽厚仁爱的个性。他不介怀纤微小事,对他人十分宽容,对不满、排挤甚至是陷害他的人,都能以宽宏博大的襟怀予以包容。其子欧阳发《先公事迹》记载:

先公为人……器度恢廓宏大,中心坦然,未尝有所屑屑于事。

至于接人待物,乐易明白,无有机虑与所疑忌……一切出于诚心直道,无所矜饰,见者莫不爱服,而天资劲正高远,无纤毫世俗之气,常人亦自不能与之合也。

先公尝言:“平生为学所得,惟平心无怨恶为难。”故于事未尝挟私喜怒以为意,虽仇讎之人,尝出死力挤陷公者,它日遇之,中心荡然,无纤芥不足之意,尝曰:“孔子言,以直报怨。夫直者,是之为是,非之为非,是非付之至公,则是亦不报也。”先公初贬滁州,盖钱明逸辈为之。自外还朝,遇明逸于京师,屡同饮宴,不以为嫌。其后公在中书,明逸罢泰州归,复用为

翰林学士。<sup>[4]2626-2628</sup>

可见,欧阳修仁厚宽和的胸襟与气度。韩愈云:“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sup>[10]</sup>欧阳修对温厚和缓、从容平正文风的喜好,既出于天性,也与儒家经典的长期熏陶密不可分。在《论尹师鲁墓志》中,欧阳修云:“《春秋》之义,痛之益至,则其辞益深,‘子般卒’是也。《诗》人之意,责之愈切,则其言愈缓,‘君子偕老’是也……其语愈缓,其意愈切,《诗》人之义也。”<sup>[4]1046</sup>意即作者情意愈痛切,则语言文词的表达愈显深沉和缓。对他入文章平正和雅的风格,欧阳修是十分推许的,如称赞友人江邻几“文章淳雅”<sup>[4]500</sup>“学问通博,文辞雅正深粹”<sup>[4]617</sup>,肯定刘敞“文辞典雅”<sup>[4]524</sup>,释秘演“雅健有诗人之意”<sup>[4]611</sup>,称颂仁宗“其辞彬彬笃厚纯雅”<sup>[4]952</sup>,赞誉梅尧臣诗“英华雅正”<sup>[4]1048</sup>,等等。在儒家学养的长期熏陶、宽和仁厚个性的影响及明确理论认识的作用下,欧阳修的文章创作逐渐形成了深醇厚、雍容和缓、宽平温雅的风格特点,时人于此多有指出。宋祁与欧阳修一同修撰《新唐书》,他在给朝廷的奏书上称赞欧阳修“学术淹该”“措辞温雅,有汉、唐余风”<sup>[9]4</sup>,苏洵说欧阳修“词令雍容似李翱”<sup>[2]1502</sup>,门生曾巩强调其文深得儒学素养熏陶,遂成深纯温厚之风格:“其深纯温厚,与孟子、韩吏部之书为相唱和……真六经之羽翼,道义之师祖也。”<sup>[11]232</sup>时人评价如此,后人同样多所肯定与推崇。南宋罗大经云:“欧阳公所以为一代文章冠冕者,固以其温雅醇正,蔼然为仁人之言,粹然为治世之音。”<sup>[12]</sup>明方孝孺称颂道:“俨尔儒者,故其文粹白纯正,出入礼乐法度中。”<sup>[13]</sup>元苏天爵云:“欧阳文忠公生宋盛时,稟中和之粹,作为文章,雍容温厚,炳然一代之制。”<sup>[14]</sup>以上评介都共同肯定了欧阳修文章上承儒家优秀传统,富有粹美之质,表现出涵淳茹和、英华浓郁的温雅风格。这里有欧阳修的朋友、门生以及后人对他的评价,这些都是当时文坛上的知名人物,他们的观点其实就代表了文坛的主流评价。

涤荡杂质、纯浸儒学,不仅使欧阳修古文呈现雍容和缓、典雅温厚的特点,而且使其文章风格更加精醇纯粹,这在与其他古文大家的风格比较中尤为突显。元陶宗仪云:“宋文章家尤多,老欧之雅粹,老苏之苍劲,长苏之神俊,而古作甚不多见。”<sup>[15]</sup>贝琼云:“盖韩之奇,柳之峻,欧阳之粹,曾之严,王之洁,苏之博,各行其体,以成一家之言。”<sup>[9]484</sup>而这又与欧阳修明道复古、革新时政、振兴古文的理想追求与现实努力密切相关。苏轼云:“自汉以来,道术不出于孔氏,而乱天下者多矣。晋以老庄亡,梁

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余年而后得韩愈,学者以愈配孟子,盖庶几焉。愈之后三百余年,而后得欧阳子,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著礼乐仁义之实,以合于大道。”<sup>[4]2755</sup>欧阳修以韩愈的继任者自居,不仅学其古文艺术的精髓,更上溯孔、孟以来儒家理想,力求革新文弊,光耀古文,复兴儒学,明道振文,这是对浮靡雕琢与险怪艰涩不正文风的有力矫正与修复,元刘埙云:“我宋盛时首以文章著者,杨亿、刘筠,学者宗之,号‘杨刘体’。然其承袭晚唐、五代之染习,以雕镌偶俪为工,又号曰‘西昆体’。欧阳公恶之,嘉祐中,知贡举,思革宿弊,故文涉浮靡者,一皆黜落,独取深醇浑厚之作。一时士论虽哗,而文体自是一变,渐复古雅。”<sup>[16]</sup>他依靠科举的力量,转变文坛不良风气,使文章重复古雅醇正。这也是一种以国家社稷为重、关注百姓民生福祉,并深具忠义之气,直言正行而形成的雍容醇厚气度。明杨士奇云:“三代而下,以仁厚为治者,莫瑜于宋。宋兴三百年,其民安于仁厚之治者,莫瑜昭陵之世。当时君臣一德,若韩、范、富、欧,号称人杰,皆以国家生民为心,以太平为己任……欧阳文忠公以古文奥学、直言正行卓卓当时,其凛然忠义之气,知有君而已,知有道而已……三代以下之文,惟欧阳文忠公行雍容醇厚气象。”<sup>[17]</sup>《宋史·欧阳修传》云:“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欧阳修又振起之。挽百川之颓波,息千古之邪说,使斯文之正气,可以羽翼大道,扶持人心,此两人之力也。”<sup>[18]</sup>欧阳修复道振文的努力,不仅弘发六经,匡扶人心,裨于世教,而且得文章正气,使古文走上了无限宽广的发展道路。

### 三

欧阳修文章温和醇正、典雅纯粹的特点,其实是儒家思想中和雅正之美观念的折射。景祐年间,欧阳修贬谪夷陵,公事之余,探究《易》理,深有创获,对中正平和之道的追求,甚有心得<sup>[19]</sup>。他说:“事无不利于正,未有不正而利者。”<sup>[4]1112</sup>又云:“必合乎大中,不可以小过也。盖仁过乎爱,患之所生也;刑过乎威,乱之所起也。推是可以知之矣。”<sup>[4]1117</sup>强调实事求是,不要偏颇,符合大中至正之道,将中正平和之道视为修身处世的信条。王恽云:“欧公文尊经尚体,于中和中做精神。”<sup>[9]441</sup>正因为崇经持中,故其文益显中和平正,能做到悲怨有度,倾抒有节,深得中正和雅之美。治平四年(1067),御史彭思永、蒋之奇劾修“帷薄不修”,与长媳吴氏关系暧昧,欧阳修连上三表自辨,其《乞罢政事第三表》曰:“至于赖天地保全之力,脱风波险陷

之危,使臣散发林丘,幅巾衡巷,以此没地,犹为幸民。”<sup>[4]1372</sup>对小人的无故诬陷诽谤表现了极大的愤怒与痛苦,寄希望于朝廷查实辩诬,满腔悲愤郁勃之情,化为恳挚深切的疏奏,“其自叙处,恳恻而不伤于激。非惟立言有体,而忠爱之诚,与洁身之义具见”<sup>[20]</sup>。《谢知制诰表》“涕洟之词,怨而不诽,悲而不伤,尤觉有感动处”<sup>[2]1753</sup>,《送田画秀才宁亲万州序》得儒家“怨而不怒之旨”<sup>[6]409</sup>,都合乎中正平和之道。这一“和气多”<sup>[9]1171</sup>、不偏不倚、不刚不柔、不怒不诽的文章自然更显和缓从容、正大雅则风貌。此平正、简约、中和的特点,更影响其子弟门生,特别是曾巩古文,便深得这种醇和儒雅的风姿之美:“南丰先生天资高,学力超诣……要其归,则严谨醇正,推其所从来,实尝师友于欧公之门”<sup>[11]812</sup>阳公之明识,而曾子固又常受业于其门,子固以六经之文,典重醇深,为公所推服”<sup>[9]624</sup>。

欧阳修文章古雅温厚的特点,还来自司马迁《史记》与班固《汉书》等史传作品风格的熏陶与影响。庆历名臣韩琦云:“子长、退之,伟贍闳肆,旷无拟伦,逮公始继。自唐之衰,文弱无气,降及五代,愈极颓敝。唯公振之,坐还醇粹,复古之功,在时莫二。”<sup>[4]2683</sup>叶盛亦云:“夫六经而下,左丘明传《春秋》,而千万世文章实祖于此。继丘明者司马子长,子长为《史记》,而力量过之,在汉为文中之雄。继子长者韩子,深醇正大,在唐为文中之王。继韩子者欧阳公,渊永和平,在宋为文中之宗。”<sup>[21]</sup>都指出欧文深受《史记》深醇正大风格的影响。班固《汉书》崇儒尚礼、醇雅温厚的思想风格特点,对欧阳修文章创作思想也有很大影响。郭预衡说:“在汉代文章的作者之间,班固的思想是最正统的,文风也是最‘醇正’的。”<sup>[22]</sup>清何焯在评点欧阳修《孙明复先生墓志铭》时,曾指出此文之雅正纯洁可与班固《汉书》相比肩:“如此古雅峻洁,何必减班孟坚。”<sup>[5]710</sup>可见,班固《汉书》以礼节情、“尔雅深厚”<sup>[23]</sup>,且“不激诡,不抑抗,贍而不秽,详而有体”<sup>[24]</sup>,能于严格法度之下呈现雍容娴雅之美的风格特点,无疑对欧阳修文章创作也产生不小的影响。因此,欧阳修古文创作既是承儒学六经之脉络,又是继司马迁、班固文章之波澜,遂成深醇正大之美。但这一平正和缓、温醇典雅的风格,有时被视为简易平庸,过于随性效仿,以至学而不至,变为浅薄率易,清张文虎云:“惟欧、曾平正,易于入手,故中材以下喜效之。”<sup>[25]</sup>对此,林纾进行了细致的阐说和辨析,他说:“须知欧、曾之文,心平气和,有类于庸,实则非庸。敛其圭角,不使槎枒于外;蓄理在中,耐人寻味。盖几经烹炼,几经洗伐,始得此不可移易之言,不矜怪异之语。乍读之似庸,味

之既久,又觉其不如是说,便不成文理。知此,足悟庸中之非庸者矣。”<sup>[26]</sup>不无道理。

由上可知,欧阳修崇尚儒学,长期接受儒家思想的浸染与熏陶,形成宽和仁厚、蔼然平易的个性,他又以明道复古、革新时政、振兴古文为人生理想与追求目标,且接受《史记》《汉书》等史传文学崇儒尚礼思想及典雅温厚的风格特点影响,遂最终形成雍容和缓、醇粹典雅、仁厚宽博的文章创作旨趣与风格特点。

## [参 考 文 献]

- [1] 朱熹. 朱子语类[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3308.
- [2] 高海夫. 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M]. 西安: 三秦出版社, 1998.
- [3] 李涂. 文章精义[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0: 73.
- [4] 李逸安. 欧阳修全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1.
- [5] 何焯. 义门读书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 [6] 慕容真. 林纾选评古文辞类纂[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6.
- [7] 沈德潜. 唐宋八家文读本[M].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8.
- [8] 黄震. 黄震全集[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3: 1871.
- [9] 洪本健. 欧阳修资料汇编[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5.
- [10] 岳珍. 韩愈文集汇校笺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0: 699.
- [11] 曾巩. 曾巩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 [12] 罗大经. 鹤林玉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264.
- [13] 方孝孺. 逊志斋集[M]. 宁波: 宁波出版社, 2000: 402.
- [14] 苏天爵. 滋溪文稿[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7: 501.
- [15] 陶宗仪. 南村辍耕录[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107.
- [16] 刘埙. 隐居通议[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144.
- [17] 杨士奇. 东里文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8: 18.
- [18] 脱脱. 宋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10375.
- [19] 洪本健. 欧阳修的“和气”与“六一风神”[J]. 国学学刊, 2014(2): 127.
- [20] 张伯行. 唐宋八大家文钞[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0: 66.
- [21] 叶盛. 水东日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230.
- [22] 郭预衡. 班固的思想和文风[J]. 社会科学战线, 1983(1): 259.
- [23] 刘熙载. 艺概[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15.
- [24] 范晔. 后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405.
- [25] 张文虎. 覆瓿集[M]//吴小林. 唐宋八大家汇评. 济南: 齐鲁书社, 1991: 250.
- [26] 林纾. 春觉斋论文[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92.

(责任编辑:程晓芝)

(下转第 94 页)